客家委員會補助大學校院發展客家學術機構計畫成果報告書

客家會館在戰後新加坡社會所扮演的角色：以應和會館為例（1945-2012）

執行單位：客家文化研究所
計畫主持人：利亮時
聯絡人：利亮時
聯絡電話：0918-450579
傳　　真：07-7166897
E-MAIL：ph868989@nknucc.nknu.edu.tw
日　　期：102 年 11 月 30 日

目錄

摘要…… ……1
第一章、緒論……..2
第一節、研究計畫之背景……2
第二節、研究目的……3
第三節、研究重要性與方法……5
第二章、華人的南來與應和會館的成立……...8
第一節、華人南來……..……8
第二節、應和會館的成立……10
第三章、二戰後的新加坡與應和會館的復辦……..13
第一節、二戰後的新加坡……..13
第二節、應和會館的重新出發……..16
第四章、新加坡建國後的應和會館……..19.
第一節、應和會館功能的弱化……..19
第二節、應和會館與客家文化……..22
第五章、結論……..23.
參考文獻……..24

圖目次

圖 1:應和會館內的關聖帝君神位……11
圖 2:應和會館設立的雙龍山……12
圖 3:應新學校的正面口……12
圖 4:新加坡政府頒給應和會館的獎狀…..……..18
圖 5:五屬義祠..……..20
圖 6:五城福地是位於照片右側的建築物..……..21
圖 7:重建後的應和大廈(亦稱麗河苑)……21

客家會館在戰後新加坡社會所扮演的角色：以應和會館為例（1945-2012）

摘要

新加坡自 1819 年萊佛士（Thomas Stamford Raffles，1781-1826）開埠以來，由於需要大量的人力資源來推動新加坡的發展，而當時新馬的人口，根本無法提供英殖民政府足夠的人力資源來發展，這導致必須引進外來的人力資源。擁有龐大人口的中國，自然成為殖民政府的目標。這股拉力再加上中國內部的民不聊生，形成的推力，促使華人大量移入新加坡，而會館亦伴隨著華人在新加坡生根。根據 1881 年殖民地人口統計，當時華人的人數是 8 萬 6 千 7 百 66 人，而華人人口的不斷移入，自然增加會館的社會功能。

中國移民隻身南來，他們來到人生地不熟的地方，自然需要會館的協助。會館亦在移民的需求下誕生，並伴隨著新加坡的發展，如 1822 年客家籍人士成立了應和會館。會館的發展幾乎是與新加坡的發展並行的，在將近兩個世紀的歲月裡，由中國帶來的會館組織，慢慢在這片土地生根發芽。然而，會館的發展模式是有別於原鄉中國，因為國情與社會結構的不同，在新加坡的會館組織自然必須自我調整來迎合社會的需求。走過一百多年的道路，經歷了英殖民統治、日本的南侵、新加坡自治、馬來西亞的成立，以及後來新加坡的獨立，會館還能夠屹立在新加坡這塊土地上，可見其確有獨特的適應機制。戰後的新加坡社會面對著完全不同於二戰之前的環境，新加坡在其政府的領導之下，歷經了快速的都市化和全球化，在這種情況之下，會館為了生存和繼續服務會員，就必須發展出不同的功能和角色。本計畫企圖以應和會館為例，來探討新加坡客家會館在戰後所扮演的社會角色。

關鍵詞：應和會館、華人、客家人、英殖民政府、新加坡社會

第一章　緒論

第一節 研究計畫之背景

移民歷史即是人類社會進程的一部份，然而移民理論、研究卻是近現代才逐漸發展。現今移民的相關研究與理論可謂成果豐碩，如著名的「推拉理論」（push and pull theory）。推拉理論認爲，在市場經濟、人口自由流動的情形之下，人口遷徙是受到原居地社會環境的影響，人們選擇遷徙到生活較優的環境，並改善較差的生活條件。明清之際東南沿海（尤以福建、廣東兩省為最），大量移民移往海外，其推力因素多是山多田少、人口壓力沈重、生活困苦等，而移居地如臺灣或東南亞則是地少人稀、謀生較容易等吸力因素。推拉理論雖可解釋人口流動的趨向與因素，然而仍過於概略，忽略族群、文化、地緣甚至政治因素的影響。Saskia Sassen[1]進一步指出並非貧窮區域的人定會往富裕區域流動，事實上仍有許多窮困居民堅守家園以待未來生活的改變。

跨界遷移的因素千百種，嚮往優渥的經濟生活當然是移民的最主要考量之一，新古典主義經濟學理論（Neoclassical economics）的代表之一Larry Sjaastad（1962）認為，之所以會有移民遷徙，往往將其所得的回報高過於其設定的目標，並獲取最高利益作為遷移準則。[2]另一方面，Oded Stark雖以新經濟移民理論（the new economics of migration）為主軸，認為經濟因素（如資金掌控）是導致人口遷移的重要因素，不過Oded Stark仍提出非個人意志的移民選擇，像是國家政策對於人口流動具有決定性的影響，二次戰後日本政府鼓勵日本國民移至拉丁美洲，臺灣國民黨政府將大陳與滇緬軍民撤回臺灣，可以顯見國家力量可以主宰著大規模人口流動，這並非單一經濟因素或理論可以解析。

Saskia Sassen是從世界體系理論（world systems theory）來探討移民行為，[3]資本主義的盛行提供人口流動的動能，工業化國家需要大量勞力，因此跨國遷移孕育而生。

不論是採取傳統的推拉模型，勞力市場在世界體系的流動，或是全球化研究面向，移民研究基所關注焦點，不再是遷移原因、移民動機或移民模式，而聚焦於移民適應或同化、移民經驗，甚至個人感受上；不再以單一的社群研究（localized community studies）為論點，研究視角變為探討跨

[1] 參見 Saskia Sassen，2006，《Guests and Aliens--客人？外人？遷移在歐洲（1800?）》。臺北：巨流。
[2] Larry Sjaastad，1962，：“The costs and returns of human migration”，Chicago：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pp. 80-93。
[3] Immanuel Wallersteing 早在 1970 年代提出世界體系的觀念，顛覆了以國家為主體的思維模式。

界移民的文化差異與認同意向。

近來海外華人研究也順應這股勢流，從把華人社會視作中國社會的延伸，轉變為注重華人社會主體性與獨有性，其在地認同及文化衝突與融合成為新的研究取向。[4]華人研究的轉向，牽動了客家研究的再思考。以往華人社會視為均質性，忽略內部方言分群的異質性，故在海外客家研究就不能循著華人研究的軌跡繞轉，應當是立基在華人研究基礎上，另闢屬於客家研究的蹊徑。

以往的研究都是把東南亞華人移民視為一個整體，但是從客家人的角度切入，則會有不同的發現，例如客家人與華人其他族群的合縱連橫關係，以及客家人居於少數的新加坡，其會館(應和會館)的成立時間卻是最早的。因此本研究計畫以應和會館為例，試圖探究客家人如何在新加坡社會中生存，以及其特殊性。

第二節 研究目的

擁有將近兩百年歷史的新加坡華人會館，在新加坡社會產生了深遠的影響。自新加坡開埠以來，英殖民地政府的鼓勵移民政策，導致了中國移民大量移入，但是早期殖民政府對華人社會都沒有直接的管理。這些來自中國的移民，在沒有殖民政府的直接管制下，他們面對的問題要靠誰來負責解決和協助，而華人會館便是在這一基礎上建立的。二戰前（1941 年）的華人會館都是由中國移民所創立的，當時會館的主要任務就是幫助新移民在陌生的環境裏安頓下來。會館為同鄉提供找尋住所、工作等服務，也讓同鄉間有一個空間來聯絡感情。除此以外，對內來說，會館是同鄉發生糾紛時的協調人；從外來看，則是同鄉與殖民政府的中間人。早期的會館，成為了同鄉的代言人和利益的維護者，不同籍貫的會館亦代表著他們本身族群的利益。

新加坡的會館組織，雖然來自中國，但是它的運作模式和在社會所扮演的角色與中國的會館有明顯的差異。在中國的會館只是為同鄉服務的機構，而新加坡的會館，除了具備前者功能外，還扮演維護和發揚本身文化的角色。殖民政府的重商政策，亦將新加坡塑造成一個有別於中國社會的新社會結構。在新加坡商人階層是社會的頂端（而中國社會則是士在社會的上層），他們也是華人社

[4] 透過二度移民（re-immigration）、離鄉（displacement）與離散（diaspora）等移民研究，能夠更貼近華人社會底層心聲，尋回失落的記憶拼圖，褪去中國色彩的糖衣。

會的代表，順理成章會館亦是以商人作為主導。

會館在社會的扮演的角色，並非一成不變，隨著社會的變化，它也不斷的在調整。例如在 19 世紀初期，它是本身族群的服務中心。移民人口不斷增加後，讓它的重要性也加強，它成為了維護族群文化、興辦學校的機構。在新加坡建國之前，華人都是以中國作為認同的對象，而會館更涉入當時的中國事務中，例如出錢出力的支持國民黨的革命和北伐。而隨著新加坡邁向建國的道路，會館的認同亦有所轉變，由「落葉歸根」轉為「落地生根」，而會館更積極參與當地的事務，並成為政治的壓力集團。經過多代人經營的部分會館，在新加坡建國後擁有了雄厚的財力，使他們更積極參與當地的事務。然而 1965 年 8 月 9 日，新加坡脫離馬來西亞宣佈獨立後，人民行動黨開始對新加坡進行改造，而會館在華人社會的重要地位，亦需要改變。會館在社會的影響力亦隨著弱化，但是會館並沒有在社會改革的洪流中消失，它在變革中不斷調整自己的腳步，終於走向重生之路。

本計畫希望利用應和會館的例子來探索會館在二戰後至今所扮演的社會角色。根據現存資料的情況和新加坡社會的變化，二戰時期可以視為會館發展研究的分水嶺。會館內許多珍藏的戰前資料與紀錄都已經被銷毀，有些是因為當時會館人員害怕被日軍找到，被用來當作清算的根據，為了避免殃及無辜，統統焚毀；有些是直接燒毀於戰火之中，因此戰前的資料可說是十分難以獲取。再者，戰後的新加坡社會面對著完全不同於二戰之前的環境，新加坡在其政府的領導之下，歷經了快速的都市化和全球化，在這種情況之下，會館為了生存和繼續服務會員，就必須發展出不同的功能和角色。而應和會館在新加坡會館發展中有著特殊的地位，除了是第一間客家人成立的會館外，還因為客家人在新加坡五大方言群中屬於少數，少數人的會館組織必須要更加靈活變遷，適應時代的變遷，才不至於被時間的洪流消滅。因此，應和會館在新加坡會館發展中具有代表性，透過對於應和會館的研究可以更加清楚看出新加坡會館在戰後所扮演的角色。

第三節 研究重要性與方法

一、研究重要性

華人會館的創立是海外華人移民的產物，如今在美國、泰國、新加坡與馬來西亞（簡稱新馬）都有會館的存在，然而新馬會館在發展上，雖然和其他地方有些相似，但是它們亦有許多獨特之處。例如會館、商人與華校的結合，成為一個連鎖的關係。這種緊密的關係最終是促進華校的發展，會館不只是文化的保護與發揚者，它亦是服務族群的中心，動員族群的基地。由此可見，會館組織在19 世紀到 20 世紀中期，一直在新加坡華人社會扮演舉足輕重的角色。

目前為此圍繞這方面的著作或論文如下:崔貴強《新加坡華人-從開埠到建國》(新加坡:新加坡宗鄉會館聯合總會，1994)。Cheng Lim Keak, *Social Change and the Chinese in Singapore: A Socio-Economic Geography with Special Reference to Bang Structure*（Singapore: Singapore University Press)。Jiann Hsieh, *Internal Structure and Socio-Cultural Change: A Chinese Case in the Multi-Ethnic Society of Singapore,* （Ph.D Dissertation, University of Pittsburgh, 1977)。李明歡《當代海外華人社團研究》(廈門: 廈門大學出版社，1995)。上述的著作都有涉及華人社團的發展，功能與結構等問題，但是都是以宏觀的角度來看，缺乏微觀的角度來深入探討新加坡的華人會館。

本研究希望觀察新加坡華人會館在新加坡發展道路所扮演的角度，從中了解會館在二戰之後，原鄉中國政治動蕩時所扮演的角色，再者是面對獨立建國道路，會館如何帶領華人認同本土，如何在新加坡建國後調整自己。

本研究希望能探討二戰之後，新加坡會館經歷的獨特過程，以此來看海外客家人如何在逆境中建立自己的一套管理機制。海外客家人的珍貴經歷可以作為台灣借鏡的地方。由於會館組織並沒有一套保存史料的機制，因此本研究希望能盡快進行，以建立這段歷史的全貌。

二、 研究方法

計畫嘗試以跨學門的宏觀視野探究，並以民族誌的田野調查方式直接深入調查。透過許多耆老親身經驗，獲得資料和觀察，以被研究者的觀點與角度來理解、詮釋和紀錄海外移民社會創立會館

的歷程，以及會館如何隨著社會的變革，而作出調整。

（1）文獻探討

本計畫擬將收集文獻資料：

1.應和會館的會議記錄(1930-至今)。

2.口述歷史訪談。

3.聚落學與移民知識之相關理論、研究。

4.民族誌等相關發展理論及文獻研究。

5.將田野收集之資訊進行整理、分析、驗證及書寫。

（2）深入訪談法

訪談，就是研究性交談，是以口頭形式，根據被詢問者的答覆，搜集客觀的、不帶偏見的事實材料，以準確地說明樣本所要代表的總體的一種方式。尤其是在研究比較複雜的問題時需要向不同類型的人瞭解不同類型的材料，以及做不同向度的交叉提問與訪談以確立事實性。

訪談是民族誌中田野調查重要也是基礎的資料蒐集方式，除了使研究者更真實的體現與觀察生活經驗也能更客觀的獲得研究對象的思考價值觀；並將其對於地方的口述資料記錄與存檔，可作為往後研究使用與佐證，及建立移民族群的遷移史概況。

本研究之訪談方式可分為兩種：

1.間接式的日常生活訪談：

本研究最主要的研究方式，透過與各族群的共同生活與勞動，此時並不設限任何主題與對象，而是透過參與共同的生活經驗與勞動中的平常性對話，直接了解與體驗研究對象的生活情境與價值觀的體現，可作為客觀的研究方式且在共同生活中更能發現其所未見的資訊。

2.直接的問卷式訪談：

主要是針對所擬定的問題和研究對象作直接的提問與訪談，將研究中所與建構之資料與問題意識作

直接的驗證。其兩種訪談方式並無固定或強烈的分開使用而是視訪談情況可做交叉應用。

第二章　華人的南來與應和會館的成立

第一節 華人南來

自 19 世紀以來，華人離鄉背井，前來東南亞謀生，至 1937 年止，馬來亞（馬來半島與新加坡）華人達 210 餘萬人，佔總人口的 41.4%，其中華人佔新加坡人口的 76.5%， 而在馬來半島的 21 個重要城鎮中，華人人口數超過居民總數 50%的就有 17 個。[5]

早期的華人移民大多扮演中間人的角色從事轉口貿易，華商負責將當地土著的產品和其他地區生產的商品進行交換，提供一個交易的管道。此外，華人也在當地進行錫礦的開採和種植業。自馬六甲王朝開始，錫就成為主要的出口商品，後來的西方殖民者也是大力的開採錫礦，尤其英國殖民時期塑造出一個良好的投資環境，以便將來英國進行大量的投資，同時馬來半島的馬來王族們為擴張勢力征戰不已，因此需要爭取大量移民增加稅收以及更多的財富來源。

從中國南來的華人與當時中國的局勢和外在誘因有密切的關係。從十九世紀上半葉開始，中國在西方列強堅船利炮的侵略下，導致整個社會發生了急劇的變化。另一方面，自清朝康雍朝(康熙、雍正、乾隆)三代，超過百年的昇平，也使人口快速的飆升。然而清代長期的閉關自守，卻使到國內的生產技術嚴重落西方諸國。這也導致人口眾多的優勢不僅沒有轉變為生產力，反而在西方的資本、技術的東來後成為了清政府的負擔。農村經濟的破產和巨大的人口壓力，令到整個清政府的經濟面臨崩潰的邊緣，而眾多的人口亦在痛苦的邊緣裡掙扎求存。廣東是當時人口壓力最大的地區之一，境內的嘉應州山多田少，平原面積狹小，過去的農業社會人口生存是依賴土地農業生產力來維持，人口增長，相對的耕地面積和稻米產量並沒有增加，單位面積土地負載力超過負荷，人口壓力形成，將人口擠壓出原居地，當時離開自己的家鄉，出外謀生幾乎成為唯一的選擇。

擁有海洋文明優勢的大英帝國，在 19 世紀不斷擴張其殖民版圖。這股勢力逐步到達了東方的世界，在印度建立據點並成立東印度公司，該公司的主要業務是與中國進行貿易。從古至今，馬六甲海峽(Malacca Straits)是中國與印度互通的重要航道。當時的荷蘭佔有馬六甲和爪哇島，使它在控制馬六甲海峽方面佔有更大的優勢。在這條航道上，英國只擁有馬六甲海峽北端的檳城，以及蘇門

[5] 蕭新煌、張維安、范振乾、林開忠、李美賢、張翰璧，2005，〈東南亞的客家會館：歷史與功能的探討〉。《亞太研究論壇》28。臺北：亞太區域研究中心，頁 191。

答臘(Sumatra)的明古連(Bencoolen)。此兩處都不是控制馬六甲海峽的理想據想，因為檳城太偏北，而明古連則是不在馬六甲海峽的航道內。因此在馬六甲航道取得一個重要據點成為當時殖民政府的首要任務。

位處中國與印度之間的新加坡島成為了英方的首選，佔有新加坡，不但能突破荷蘭對馬六甲海峽的控制，而且可確保英國東印度公司駛往中國的商船，可在新加坡進行食水與供應品的補給和維修服務。更重要的是可利用新加坡之便與馬來亞、印尼和中南半島進行貿易，使新加坡成為中國和東南亞產物的集散中心，以及發展其成為一個繁盛的轉口貿易商港。上述的誘因，促使東印度公司來新加坡設立商站，而明古連副總督萊佛士（Thomas Stamford Raffles，1781-1826），受委到新加坡勘察。1819 年 1 月 29 日，萊佛士登陸新加坡，當時的新加坡只是一個小漁村，人口據說只有 150 人(其中華人只有 30 名)。為了盡快落實英國東印度公司的計劃，萊佛士於 1 月 30 日就與治理當地的天猛公（Temenggong，馬來酋長）阿都拉曼（Abdul Rahmen）簽訂臨時合約，讓東印度公司在新加坡設立商站。2 月 6 日則與柔佛州蘇丹胡先（Sultan Hussein）[6]正式簽約租用新加坡。英國東印度公司亦正式在馬來甲海峽佔有了一個重要的據點。

1824 年是關鍵的一年，因為該年的 3 月 17 日英國和荷蘭達成協議，重新劃分兩個國家在東南亞的勢力範圍。英人讓出東印度群島和明古連，而荷人則退出馬來亞。這也奠定英國在馬來亞的勢力，逐步實行對馬來亞的殖民統治。解除了後顧之憂，英殖民政府自然全力的發展馬來亞。在發展的同時，面對是人力資源不足的問題。因為以當時新馬的人口，根本無法提供殖民政府足夠的人力資源來發展，這導致必須引進外來的人力資源。擁有龐大人口的中國，自然成為殖民政府招攬的目標。[7]當時的中國內部則是混亂不堪，人民生活陷入困境，出洋謀生成為了求生的途徑。中國內部生存條件惡劣，形成內部過多的勞動力。這種情況呈現一種“推力”(push)將過剩的人口推出;新馬地區地廣人稀，急需人力進行開發的工作，因而產生一種“拉力”(pull)。在這兩力的相互拉扯下，大量的中國移民進入了新馬地區。

1876 年以前，在中國通商口岸至少有 6 家苦力機構為新加坡提供勞動力，除了商人設立的洋行，亦有中國人開設的合記(音譯)、元興行(音譯)、地常(音譯)等公司，前兩家設在汕頭，後一家設

[6] 當時的新加坡屬於柔佛州的領土。
[7] Chiang Hai Ding, 1978. *A History of Straits Settlements Foreign Trade 1870-1915*. Singapore: National Museum, pp.8-9.

在廈門。[8]南來新加坡的華人除了契約勞工，還有大量以親屬和同鄉關係為基礎的牽引型移民，這包括了早期移民的妻子、兒女、兄弟、家族成員，以及移民在海外開設公司所需的幫手、員工等等。這些南來的華人，主要來自中國南方的沿海省份，族群方面主要有廣府人、福建人、潮州人、客家人和海南人。新加坡這個小島在英國人的建設下，在不到一個世紀的時間，人口從昔日開埠前的一百五十餘人，增至將近百萬人的數量，而華人是其中的最大族群。從二十世紀初期至今，華人一直是新加坡的最大族群。華人的大量南下，改變了新加坡原本的面貌，華人把原鄉的文化、風俗帶來了這個異地，其中包括了廟宇與會館等。

第二節 應和會館的成立

新加坡應和會館於 1822 年由祖籍廣東省梅縣、興寧、五華、平遠和蕉嶺五個縣屬的人士所組成。會館的成立宗旨是團結鄉人，聯絡感情，以謀求共同福利。會館為何以「應和」為名?據會館的史料顯示，嘉應州五屬人士遠度重洋，異地謀生，應以互助為先，和睦共處為重。凡事要和衷共濟，大公無私。才能發揚光大，維持久遠。因此突顯「應和」兩字，將之作為會館的名字。[9]應和會館創立之初，除了照顧同鄉之外，亦是一個供同鄉祭祀的中心。會館正廳奉祀關聖帝君的神位，上有橫匾「帝德無私」。左右懸對聯一副，左聯是「兄玄德弟翼德德兄德弟」，右聯是「師臥龍友子龍龍師龍友」(見圖 1)。在會館設關聖帝君神位，以讓遠離家鄉的同鄉有一祭祀之處，以保其平安，並讓他們有一精神之支柱。應和會館設立的關聖帝君，只是一個牌位，並沒有立神像，這也充份展現客家人祭祀的特色。客家人多拜忠義之士，關聖帝君自然成為嘉應五屬祭拜的對象，而且嘉應五屬人士下南洋，多是單身之異姓同鄉，聯合組織同鄉團體，以便互助合作，頗類似三國時代的桃園結義。

[8] 王省吾，1978，《中國人的移民機構 1848-1888 年》。舊金山:華人資料中心，頁 355-360。
[9] 陳波生主編，2003，《應和會館 181 周年會慶暨大廈落成紀念特刊》。新加坡:應和會館，頁 33。

圖 1: 應和會館內的關聖帝君神位。

應和會館於 1822 年成立之後，致力於同鄉的事務，1887 年購置荷蘭路(Holland Road)雙龍山一百多英畝的地段，作為埋葬終老同鄉之義山(見圖 2)。除了讓同鄉老有所終外，會館也不忘同鄉子弟的教育，並於 1905 年 5 月 5 日，創辦應新學堂(其後更名為應新學校)(見圖 3)。應新學校是新加坡最早創設的新式學校，該校在教學法與課本均採用新標準。應新學校的經費除學費外，不敷款項全由應和會館的董監事捐助。[10]應和會館從創辦至茁壯，一直想方設法為同鄉謀福利，除了設立義山、學校之外，會館在 1920 年代創辦嘉應五屬留醫院，敦請客籍名醫葉七醫生為院長，並在雙龍山義山處建留醫院一座，以造福嘉應五屬的同鄉。從 19 世紀初期直至日軍南侵之前，應和會館是一所多功能的社團，為嘉應州同鄉做了不少的事。

[10] 賴涯橋主編，2012，《應和會館 190 周年慶典暨第三屆世界嘉應同鄉聯誼會》。新加坡:應和會館，頁 99。

圖 2: 應和會館設立的雙龍山。

圖 3: 應新學校的正門口。

第三章、二戰後的新加坡與應和會館的復辦

第一節 二戰後的新加坡

二戰後，大部分東南亞地區仍屬殖民地。日本發動的太平洋戰爭，使各地殖民政府的控制權大受動搖。日軍於 1945 年 8 月 15 日宣佈投降後，就開始撤出新馬地區，而英軍則在 9 月 5 日到達新加坡。然而，在將近兩個星期的空窗期，馬共分子開始出來捉漢奸，讓人民知道他們的存在。二戰結束後，因抗日而壯大的馬共，[11]不被歸來的殖民政府接納為合法組織。於是他們發動武裝政變，冀望奪取新馬殖民地的政權，以建立馬共政府。殖民政府與共產勢力便陷入爭戰，以致發生了 1948 年的「緊急狀態」(Darurat)。因為共產勢力的威脅，殖民政府對中共政權懷有極大的顧忌和敵意。1949 年以後，政府對華人社會實施嚴厲的移民政策，中斷了新馬地區華人社會與中國的關係。[12]同時，政府也把新加坡從馬來亞分割出去，成為另一個政治單位。表面上，殖民政府是擔憂，新加坡加入馬來亞會增加華族人口的比例，對馬來人的政治利益將造成損害。[13]事實上，殖民政府更擔憂共產勢力利用華人奪取政權。在這過程中，殖民政府擔心華文教育會受共產主義滲透，淪為宣傳其意識形態的工具，因而實施加強管制的政策。

英國殖民政府重新回到新加坡，除了面對共產黨的威脅外，日本能夠擊敗這個昔日雄霸世界的強國，亦令當地人民對英國人能夠給予保衛這片土地的信心，完全的破滅。新加坡人民的反殖力量日漸壯大，要求自決、自治的聲音越來越大。在這種情況下，英殖民政府開始在政策上進行調整。從 1948 年至 1959 年間，殖民政府在政治採取漸進式的開放，1948 年新加坡舉行了有史以來的第一次選舉，但只限於立法議院(Legislative Council)22 席中的 6 席。

1955 年殖民政府落實立法議院民選制度，並舉行第一次大選(選出 25 席的立法議員，尚有近半數的立法議員是由官委的)，讓新加坡步向半自治的狀態，當時的勞工陣線（Labour Front）贏

---

11 二戰前的馬共沒有遊擊隊組織，但日侵時戰敗的英殖民政府，希望民眾支援他們抗日，因此鼓勵馬共組織遊擊隊來抗日。日軍投降後，馬共在各地搜獲許多遺棄的兵器、彈藥和糧食，這都增強他們的武裝勢力。韓元山、李永樂，1988，〈戰時馬共組織概況〉，見《馬共秘聞》。新加坡：勝利出版私人有限公司，頁 22-23。

12 1951 年 9 月 30 日後，新馬與中國斷交，任何人不能再由中國申請回新馬。見《南洋商報》（新加坡），1951 年 7 月 1 日。

13 K.G. Tregonning,1966, *Malaysia and Singapore*. Singapore: Donald Moore, pp.35-36.

得了 10 席，遂與馬來半島的聯盟[14]與官委議員組成聯合政府，而勞工陣線領袖馬紹爾（David Marshall）成為新加坡首任首席部長。1958 年 5 月，自治協定簽署。隔年(1959 年)新加坡舉行了第一次的普選，在該年 5 月的選舉中，人民行動黨(People`s Action Party)贏得了 51 席[15]中的 43 席。行動黨秘書長李光耀出任總理，同年底尤索伊薩(Yusof bin Ishak)成為這個殖民地自治邦的元首。

踏入了 1960 年代，新加坡經歷了首件大事:1963 年 9 月 16 日，新加坡加入了馬來西亞成為一州。新加坡人民行動黨政府自 1959 年獲得政權之後，就一直致力於新馬的合併。為了讓新加坡能夠和馬來亞合併，當時的總理李光耀積極遊說，尤其是馬來亞首相東姑阿都拉曼(Tunku Abdul Rahman)對於接納新加坡為馬來亞一州的意願不是很高。東姑阿都拉曼擔心新加坡的加入會導致華人人口超越馬來族群的人數，這將直接影響馬來人未來對這個國家的掌控權。李光耀明白東姑阿都拉曼的疑慮「擔心種族平衡會受到破壞，懷疑新加坡華人大多同情共產黨。」[16]要消除馬來亞領導人的猜疑與不安，除了有具體的方法來表示效忠之外，李光耀也提出一個「大聯邦」方案，就是把英國在婆羅洲的三個屬地(沙巴、砂勞越與文萊)和新加坡組成一個聯邦，使其他族群人數不會影響馬來族群的多數地位。英國方面相當支持李氏的建議，開始積極去遊說東姑阿都拉曼。1961 年 5 月 27 日，東姑阿都拉曼在公開場合表示:「馬來亞遲早應該同英國以及新加坡、北婆羅洲、文萊和砂勞越的人民取得諒解。目前時機還未成熟，我不能說如何取得這種諒解，但是我們無論如何必須展望這個目標，並且考慮採取某種計劃，把這些地區更緊密聯繫在一起，進行政治和經濟合作。」[17]東姑阿都拉曼態度的轉變，主要的考量在於若讓新加坡獨立，共產黨可能有機可乘，奪得該國的政權，這將會直接影響到馬來亞的安全。東姑阿都拉曼與他的主要幕僚，如阿都拉薩(Abdul Razak bin Haji Dato' Hussein Al-Haj)與依斯邁(Ismail Abdul Rahman)在兩害相權取其輕的情況，選擇讓新加坡加入成為馬來西亞大家庭的一員，以防止共產黨的壯大。

---

[14] 由巫統，馬華公會和印度國大黨組成的聯盟政府。巫統，全名為全國巫人統一機構（United Malays National Organisation, 簡稱 UMNO）。創黨人是柔佛州貴族拿督翁惹化（Datuk Onn Jaafar）。該黨於 1946 年 5 月 11 日，由馬來亞數十個馬來團體為反對馬來亞聯邦計劃，共同組織而成的。該黨是聯盟的第一大黨，亦是馬來西亞最有影響力的政黨; 馬華公會(Malayan Chinese Association，簡稱 MCA)，中文全稱馬來亞華人公會(1963 年之後改稱為馬來西亞華人公會)，是馬來西亞華人的政治組織。該黨於 1949 年順應緊急狀態的形勢，在英殖民地政府的鼓勵下成立，主要創黨人為陳禎祿。初期只是福利機構，1951 年才正式改章程成為名符其實的政黨; 印度國大黨(Malayan Indian Congress)是代表馬來西亞印度人的政黨，創立於 1946 年。1954 年 10 月該黨加入巫統與馬華的聯盟後，一直都是執政黨的成員之一。

[15] 人民行動黨的候選人中，34 位是華人，10 位是馬來人，6 位印度人和 1 位歐亞裔。見李光耀，1998，《李光耀回憶錄 1923-1965》。新加坡:世界書局，頁 352。

[16] 李光耀，1998，《李光耀回憶錄 1923-1965》。新加坡:世界書局，頁 422。

[17] 《南洋商報》(新加坡)，1961 年 5 月 28 日; 李光耀，1998，《李光耀回憶錄 1923-1965》。新加坡:世界書局，頁 425。

馬來西亞合併的道路，並非一條康莊大道，內中有著新馬存在的族群矛盾，新加坡與婆羅州領導層之間就未來合併之後，在施政方針上的歧見，新馬內部左派力量的干擾，外國勢力的介入等等。這些問題都令整個合併的過程充滿了變數。從 1961 年至 1963 年，英國方面與東姑阿都拉曼，李光耀等領導人，進行了多方的協商。在這兩年的協商過程中，新馬領袖仍有許多歧異的地方，這些問題最終在妥協與退讓的情形下完成，而 1963 年 9 月 16 日，馬來西亞終於成立。

馬來西亞的成立除了新馬領導仍有歧見外，鄰國的印尼與菲律賓也表達了他們反對的意見。9 月 16 日印尼立即跟馬來西亞斷絕邦交，印尼群眾聚集在馬來西亞大使館和英國大使館，表達了強烈的不滿。另一方面，新馬的領導人，在馬來西亞成立之前存在著許多的爭議的課題。這包括了新加坡方面要求刑事法臨時條款規定不必經過審判便能拘留私會黨歹徒的權力下放給新加坡;為了防止新加坡公民中的共產黨人成為馬來西亞公民，中央方面要修改憲法，限制新加坡公民進入馬來西亞，而新加坡方面要求雙方應該一樣，即新加坡的州政府也可以禁止馬來西亞公民前來新加坡;為了防止貪污事件的發生，新加坡爭取保留州總檢察長，可根據新加坡防止貪污法令進行起訴的權力。以東姑阿都拉曼為首的中央政權，相當不願意答應新加坡州政府的上述要求。透過新加坡李光耀的策略，令英國這個宗主國支持新加坡爭取的事項。[18]這次的政治角力，以東姑阿都拉曼領導的中央政府雖然居於下風，但是也引起他與其閣員對李光耀與人民行動黨的仇視。[19]馬來西亞成立之後，中央與新加坡州之間，仍然在暗力角力，尤其是中央希望將影響力進入新加坡，甚至能夠擊敗人民行動黨，取而代之其在新加坡的領導地位。合併數日後在新加坡的選舉，更令東姑阿都拉曼感受到人民行動黨的威脅。

1963 年 9 月 21 日的選舉，可以說是奠定人民行動黨政權的重要一役。該黨在 51 席中，贏得了 37 席，而主要對手社陣只奪得 13 席，另 1 席則是由人民統一黨取得。[20]這次選舉對執政的人民行動黨，具有多重的意義:執政地位更趨鞏固是其一;成功擊潰新加坡左派的力量是其二;人民行動黨，除了得到大部分華人選民的支持外，也成功取得馬來人選民的信任，讓行動黨在三個馬來人佔多數的選區[21]勝出，使人民行動黨成為一個多元族群的政黨是其三。

---

[18] 李光耀，1998，《李光耀回憶錄 1923-1965》。新加坡:世界書局，頁 569。
[19] 同上。
[20] 《南洋商報》(新加坡)，1963 年 9 月 23 日。
[21] 三個選區分別是南部島嶼(Southern Islands)、甘榜景萬岸(Kampong Kembangan)和芽籠士乃(Geylang Serai)。

新加坡聯盟的慘敗，也令中央政府驚覺人民行動黨的政治動能。另一方面，也加劇巫統對人民行動黨的不滿。人民行動黨在馬來選區的勝利，證明該黨的多元族群路線得到新加坡馬來族群的認同，這股思潮若吹至馬來半島，將可能危及巫統的執政地位。

殖民政府統治下的新馬地區，本來就是把不同族群採取分而治之的方式，族群之間長期的隔閡，造成了彼此存了許多的猜疑與誤解。獨立建國與殖民政府的退場，只是權力之間的轉移，族群問題並沒有因此而得到解決。族群關係在新馬地區是相當的脆弱，而別有用心的政客正利用這一點來達到他們的目的。族群之間存在的鴻溝，在政治人物、特定媒體的不斷操弄之下，導致了馬來人與華人之間的關係日益緊張。人民行動黨於 1964 年 3 月宣佈參加馬來西亞全國大選，令巫統相當的不悅。1964 年的選舉聯盟大勝取得 89 席(馬來半島的國會議席共 104 席)[22]，而北上的人民行動黨，競選 9 席之中，只有蒂凡那(C.V.Devan Nair)在孟沙(Bangsar)國會選區勝出。[23]巫統領導下的聯盟，雖然在選舉中取得亮麗的戰績，但是這並不代表可以減少巫統對人民行動黨北上挑戰中央政權的不滿。這也讓中央與新加坡政府之間的矛盾繼續擴大，最終導致日後的分家。

第二節、應和會館的重新出發

新加坡應和會館從 1822 年至 1942 年，超過一世紀，其會務一直執行非常順利。1942 年 2 月日軍攻陷新加坡，會務因此停頓下來。1945 年 8 月新加坡光復之後，會館積極招募會員，使得會員人數從原本的四百人快速增加至六百餘人。此後會員人數一直都有所增加，1961 年 11 月應和會館全體董監事會議，議決擴大徵求會員，嗣經董事部的努力下，1962 年終，會員突增至一千六百人左右，令會館日益壯大。[24]

應和會館的會務在戰後呈現欣欣向榮的景象，另一方面，新加坡嘉應五屬的人士日漸增加，居住的區域也有所不同，為了讓各地區同鄉有一個聯絡情誼的地方，新加坡各地區紛紛成立會館，例如 1947 年成立的五華同鄉總會，會所座落在芽籠廿巷(Geylang lorong 20)；同年(1947 年)在義順地區的嘉應州人士成立了嘉僑同鄉會；1956 年興寧人士亦在芽籠卅巷(Geylang lorong 30)成立興寧同

[22] R.S. Milne, 1967, *Government and Politics in Malaysia*. Boston:Houghton Mifflin, p.361.
[23] http://en.wikipedia.org/wiki/Malaysian_general_election,_1964.
[24] 應和會館特刊編委會，1965，《星洲應和會館一百四十一周年紀念特刊》。新加坡:應和會館，頁 12。

鄉會；1957 年居住在武吉知馬(Bukit Timah)的嘉應人士合力創建了嘉應五屬公會；1967 年嘉應州三屬人士(梅縣、蕉嶺與平遠)在芽籠 8 巷(Geylang lorong 8)創立梅蕉平同鄉會。[25]五個在二戰後成立的客家團體，後來都加入應和會館成為團體會員。五個團體會員派代表進入應和會館的董監事領導層，讓應和會館的力量更加壯大。

應和會館的角色在二戰後也開始出現一些轉變，二戰前應和會館與其他華人會館一樣，關心與參與的都是中國的事務，例如當 1937 年中日戰爭爆發，新馬華人欲救助陷入戰火的中國，當時的華人社會共同推舉福建會館主席陳嘉庚領導「星馬籌賑會」資助中國的抗日戰爭，而應和會館相當積極參與其中。二戰後，共產黨與國民黨內戰，最後中共取得中國大陸的統治權，西方民主陣營開始採取防堵的政策，而作為英國殖民地的新加坡自然要與中國共產黨斷絕關係。新加坡的華人意識到無法回中國大陸，而新加坡才是未來的永久家園，因此在認同上開始轉向落地生根。應和會館領導層自然清楚時局的轉變，因此開始專注與參與在地事務，例如在新馬合併時，應和會館幫助政府向同鄉宣傳合併各種好處，該會更獲新加坡州元首尤索依薩頒發馬來西亞獎狀，以示感謝(見圖 4)。

[25] 陳波生主編，2003，《應和會館 181 周年會慶暨大廈落成紀念特刊》。新加坡:應和會館，頁 51-54。

馬來西亞獎狀

此頒特薩依・夫素尤首元州坡嘉新

馬來西亞獎狀予 應和會館

於一九六二年

舉行合併及馬來西亞全民投票之際，曾作巨大貢獻；並於新嘉坡政府推行通過合併及馬來西亞以達到獨立之時，尤不遺餘力，擁護支持，念茲殊勞，宜予嘉獎，茲特頒發獎狀予 應和會館，用示政府不忘勞績之至意。

新嘉坡州元首

尤素夫・依薩

一九六三年十二月廿七日頒於元首府

圖 4: 新加坡政府頒給應和會館的獎狀。

從 1960 年代初期應和會館參與的事務來看，該會館積極參與在地事務，例如就新馬合併一事，除了幫助政府宣傳外，亦派代表參加中華總商會的討論新馬合併的大會。1961 年當新加坡河水山木屋區發生大火災時，應和會館為災民募捐救濟金，另在 1963 年應和會館捐款建立昭南時代殉難的僑胞紀念碑等等。應和會館全力投入在地事務，顯示嘉應五屬人士把新加坡當成永久的家園，大家積極投入在地的事務。當新馬分家之後，政治形勢開始轉變，執政的人民行動黨全力打造新加坡人的新加坡，並全力推動建設，這對應和會館都產生一些衝擊，接下來將一一進行論述。

第四章、新加坡建國後的應和會館

第一節、應和會館功能的弱化

1965 年 8 月 9 日，新馬從此分家，也是新加坡獨立建國的大日子，這一天是這個城市小國歷史的新一頁。然而這個在當時擁有 200 萬人口的國家，面對的是經濟、外交、國防與族群關係等棘手的問題。在眾多問題之中，經濟是人民行動黨首先要處理的。原因在於退出馬來西亞之後，鄰國的敵視態度使經濟情形更加惡劣，失業人口不斷的上升，這都對這個國家造成致命的危機。政府團隊重新打造新加坡的經濟，讓這個小國的經濟不再只靠長堤的另一邊，以及新加坡南方的傳統市場，而是以世界為市場，把這個國家的經濟生命力提高。全面發展新加坡，包括了規劃經濟、國土、教育等等，以提升人民的整體水平和強化國家在世界的競爭力。

為了生存與發展，人民行動黨將國家利益擺在第一位，團結全民成為了該黨的治國首要任務。人民行動黨致力把「新加坡人」的我群觀置於華人、馬來人、印度人之上。人民行動黨方面，不標榜為任何民族的政黨，而是全民的政黨。在此基礎上，人民行動黨統一國內的教育、語言，以打造一個「新加坡人」的社會。在語言上，人民行動黨確立英文是新加坡通向國際的語文，對外是與國際社會接軌的媒介，對內則是溝通新加坡各民族的中立語文，讓各族人民在一個共同的基礎上進行公平的競爭。英文將是新加坡教育未來的首要介語，在此情形下，原本的華文教育、馬來文教育將走向整合為符合新加坡既定政策的國家教育。應和會館創辦的學校也面臨解散的命運，該會館創辦的應新學校於 1970 年代初期就已經在學生人數逐年下滑，宣佈停辦。[26]

政府角色的強化，自然讓昔日的社團組織功能逐步被弱化。以應和會館為例，在殖民地時代他們是照顧族群，為族群開辦教育，也是族群的代言人。在新加坡建國後，這些功能都被政府取代，全民的政府自然要照顧全民，為國內人民辦符合國家發展的教育，以及代表全民發聲。應和會館辦的學校走入了歷史，聯絡鄉親的功能也部分被組屋（國宅）內的聯絡所取代。在族群政策上，政府以華人這個我群觀來統合國內的各方言群（福建、潮州、廣東、客家與海南），在此情形下，會館的角色變得更為次要。應和會館在新加坡建國之後，其功能性的逐步被取代，使會館必須進行調整。

應和會館從創辦到新加坡建國已經逾一個世紀，該會館在先賢高瞻遠矚的帶領下，為會館購置

[26] 陳波生主編，2003，《應和會館 181 周年會慶暨大廈落成紀念特刊》。新加坡:應和會館，頁 94-95。

了許多的產業，例如雙龍山、中國街店屋兩間、馬來街店屋一間等等，這些都為會館的永繼經營奠下了穩固的基礎。

由於新加坡地少人稠，在建國期間，政府陸續徵用許多的私有地以供國家發展，這也直接影響到應和會館。該會館名下的雙龍山，擁有一百二十多英畝的土地，在 1960 年代被政府徵用了九成半的土地。1969 年應和會館在剩餘的四依格(acre)半土地上重造整齊的新型墳場，當年被譽為模範墳場。受保留之五屬義祠(見圖 5)則是安放嘉應州先人的牌位與骨灰瓮。

圖 5: 五屬義祠

自新加坡建國之後，土地陸續被徵用，其中包括了應和會館位於直落亞逸路(Telok Ayer street)會所旁的五城福地，該建築物於 1980 年代亦因為擴建道路的需要而被徵用(見圖 6)。應和會館的產業被政府所徵用，確實對會館產生頗大的影響，而當時領導人想方設法扭轉此頹勢，例如 1960 年代雙龍山被徵用之後，當時的會長曾德銓與董監事的一致決意，把政府的賠償用作持續發展上。在審慎的評估下，會館領導層決定用土地賠償所得-新幣 21 萬 6 千元購入里巴巴利路(River Valley)的土地，積極展開大廈的建設發展。大廈建成後所有的租金收入用來輔助會館的活動經費，而在 2000 年會館通過重建計劃，並在 2003 年 10 月 4 日完成重建工程(見圖 7)。[27]

[27] 賴涯橋主編，2012，《應和會館 190 周年慶典暨第三屆世界嘉應同鄉聯誼會》。新加坡:應和會館，頁 63。

圖 6: 五城福地是位於照片右側的建築。

圖 7: 重建後的應和大厦(亦稱麗河苑)。

應和會館的領導層在面對新加坡社會的變遷，能夠靈活應對，讓會館的基礎紮的更穩固。在組織上應和會館在新加坡建國後，就積極加強與五個團體會員(五華同鄉總會，嘉僑同鄉會，興寧同鄉會，嘉應五屬公會和梅蕉平同鄉會)的聯結，並在 1973 年 9 月 30 日共同組成新加坡嘉屬會館聯合會(簡稱嘉聯會)，以把六個會館的力量集合起來。

面對新加坡建國後急速的變化，會館在族群教育舞台上退了下來，政府接手所有源流的教育系

統。另外，移民在 1950 年代初期，英國與中國大陸斷交，讓中國移民無法往返，自此中國移民無法南下，而會館照顧同鄉功能的重要性，也隨著移民進入第二、三代後，開始減弱。會館作為聯絡同鄉的場所也漸被由政府設立的社區中心(Community centre)所取代。在 1965 年 8 月 9 日之後，應和會館與其他華人傳統會館一樣面對了功能逐漸弱化的窘境。應和會館如何因應當時的困局，這將在下一節討論之。

第二節、應和會館與客家文化

在面對社會變遷的大浪潮下，如上一節所述，在財政上，應和會館在領導團隊運用現代商業知識，結合先賢打下的基礎，把會館的財政進一步的鞏固起來。應和會館自然清楚在建國後，其原本辦教育和照顧同鄉的功能都漸漸消失或弱化。應和會館在二十一世紀的今天，開始進行轉型，其中捍衛文化成為會館的重要任務。應和會館在 2002 年 8 月成立了客家山歌團，其成立宗旨是:「推廣客家歌曲，傳承客家文化」。[28]除此之外，應和會館於 2008 年成立華樂團，成立主因是為熱心華族樂器演奏者提供一個演習平台，提高族群傳統音樂的藝術水平，通過器樂配合客家山歌的演唱，擴大客家山歌的感染力和滲透力，同時，用華族樂器演繹客家山歌，讓客家年輕子弟接受並親近客家文化音樂藝術。[29]台灣客家委員會推動的海外客家研究對於新加坡客家族群是有某種程度的影響，應和會館功能漸步減少之後，該會館主要是從山歌與華樂來推動客家文化的保留，他們很少從研究的角度來思考文化的保留與傳承。當應和會館接觸到研究海外客家的團隊，使他們意識到研究客家也是保存文化的重要一環，因此他們推動一系列的客家文化演講，設立學習客家話班，以及支持客家學術研究的出版等。應和會館在 21 世紀的十多年間，在內部思變，外部刺激的情形下，不斷調整本身的定位，讓應和會館能夠繼續在族群事務中盡一份力。應和會館已經退守至族群文化的區塊，未來如何讓會館繼續在客家文化傳承中扮演重要的角色，這仍需接下來的領導者去努力達成的。

[28] 賴涯橋主編，2012，《應和會館 190 周年慶典暨第三屆世界嘉應同鄉聯誼會》。新加坡:應和會館，頁 110。
[29] 同上，頁 109。

第五章　結論

自新加坡開埠以來，英殖民地政府的鼓勵移民政策，吸引了中國移民大量移入，但是早期殖民政府對華人社會都沒有直接的管理。這些來自中國的移民，在沒有英殖民政府的直接管制下，他們面對的問題要靠誰來負責解決和協助？而華人會館便是在這一基礎上建立的。會館是華人社會珍貴的資產，而新加坡的客家會館，見證了客家人走過的歷史道路，以及成為客家人的重要資產，其中應和會館是當中的重要代表。客家人與他們所屬的會館在社會所扮演的角色，並非一成不變，隨著社會的變化，會館也不斷的在調整。例如在19世紀初期，她是本身族群的服務中心。移民人口不斷增加後，讓會館變得更加重要，其成為了維護族群文化、照顧同鄉和興辦學校的機構。在新加坡獨立建國之前，客家人與其他籍貫的華人一樣都是以中國作為認同的對象，而會館更涉入當時的中國事務中，例如出錢出力的支持國民黨的革命、北伐和抗日。而隨著邁向建國的道路，客家人的認同亦有所轉變，由「落葉歸根」轉為「落地生根」，而會館更積極參與當地的事務，並成為政治的壓力集團。經過多代人經營的會館擁有了雄厚的財力，使他們更積極參與當地的事務。就應和會館的個案來看，會館都在致力為同鄉服務，在國家脫離殖民統治取得自治後，會館在照顧同鄉的同時，在認同上也隨著轉變。

新馬因族群矛盾而分家後，新加坡在1965年8月9日獨立建國，執政的人民行動黨政府鼓吹國家認同與「新加坡人」的我群觀念。為了強化政府的理念與政策，政府不允許會館繼續成為族群的代表。新加坡制定了政策公平等待國內各族群，設立社區中心取代會館的聯誼功能。在政府角色強化的同時，亦等於逐步在弱化會館在族群的影響力，應和會館自然也是受影響的華人會館之一。時至今日，應和會館的功能只在族群文化發揚上扮演角色，在教育與政治上是完全退場。總的來說，在1965年至今的四十多年間，應和會館則是退守一隅，只在族群文化上繼續奮戰，未來如何靠多代先賢留下的鞏固根基下，為族群投下更大的心力，這都仰賴未來領導層對這個議題的重視程度。

參考文獻

一、專書

Anderson, Benedict 著，吳叡人譯，1999，《想象的共同體：民族主義的起源與散佈》。臺北：時報文化。

Maurice Halbwachs 著，華然、郭金華譯，2002，《論集體記憶》。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Sassen, Saskia，2006，中譯本《Guests and Aliens--客人？外人？遷移在歐洲（1800?）》，台北：巨流。

Victor Purcell 著，張奕善譯，1966，《近代馬來亞華人》。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股份有限公司。

王明珂，1997，《華夏邊緣——歷史記憶與族群認同》。臺北：允晨。

王省吾，1978，《中國人的移民機構 1848-1888 年》。舊金山：華人資料中心。

安煥然、劉莉晶編，2007，《柔佛客家人的移植與拓墾》。新山：南方學院出版社、新山客家公會。

吳華，1980，《馬來西亞華族會館史略》。新加坡：新加坡東南亞研究所。

李元瑾編，2002，《新馬華人：傳統與現代的對話》。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學中華語言文化中心。

李光耀，1998，《李光耀回憶錄 1923-1965》。新加坡:世界書局。

李國鼎，1966，《第一個馬來西亞計畫（1966-70 年）》。臺北：國際經濟資料中心。

房學嘉，1994，《客家源流探奧》。廣州：廣東高等教育出版社。

麥留芳，1985，《方言群認同：早期星馬華人的分類法則》。臺北：中研院民族學研究所。

陳波生主編，2003，《應和會館181周年會慶暨大廈落成紀念特刊》。新加坡:應和會館。

曾少聰，2004，《漂泊與根植：當代東南亞華人族群關係研究》。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

黃應貴，2006，《人類學的視野》。臺北：群學。

黃應貴主編，1999，《時間、歷史與記憶》。臺北：中研院民族所。

賴涯橋主編，2012，《應和會館 190 周年慶典暨第三屆世界嘉應同鄉聯誼會》。新加坡:應和會館。

潘明智編，1996，《華人社會與宗鄉會館》。新加坡：玲子大眾傳播中心。

鄭赤琰編，2002，《客家與東南亞》。香港：三聯。

蕭新煌編，2011，《東南亞客家的變貌：新加坡與馬來西亞》。臺北：亞太區域研究專題中心。

應和會館特刊編委會，1965，《星洲應和會館一百四十一周年紀念特刊》。新加坡:應和會館。

Barth, Fredrik ed, 1998, *Ethnic Groups and Boundaries*, USA：Waveland Press.

Carstens, Sharon, 1980, *A Images of Community in A Chinese Malaysian Settlement*. 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Chiang Hai Ding, 1978. *A History of Straits Settlements Foreign Trade 1870-1915*. Singapore: National Museum.

Freedman, Maurice， 1994, *The Study of Chinese Society：Essays by Maurice Freedman*. Taipei：SMG. Press.

Milne, R.S., 1967, *Government and Politics in Malaysia*. Boston:Houghton Mifflin.

Tregonning, K.G.,1966, *Malaysia and Singapore.* Singapore: Donald Moore.

二、專書論文

司徒尚紀，2002，〈南海交通的歷史興衰與客家人移居東南亞〉。收入於鄭赤琰編，《客家與東南亞》。香港：三聯。

利亮時，2011，〈錫、礦家與會館：以雪蘭莪嘉應會館和檳城嘉應會館為例。收入於蕭新煌編，《東南亞客家的變貌：新加坡與馬來西亞》。臺北：亞太區域研究專題中心。

韓元山、李永樂，1988，〈戰時馬共組織概況〉，見《馬共秘聞》。新加坡：勝利出版私人有限公司。

顏清湟著，陳翰譯，1996，〈新馬早期客家方言組織〉。收錄於潘明智編，《華人社會與宗鄉會館》。新加坡：玲子大眾傳播中心。

Barth, Fredrik, 1998, "Introduction." in *Ethnic Groups and Boundaries*, ed. by Fredrik Barth. USA：Waveland Press.

三、期刊論文

謝劍，2006，〈東南亞華人的認同問題：對 R. J. Coughling 雙重認同理論的再思考〉。《臺灣東南亞學刊》3.2：3-18。

蕭新煌、張維安、范振乾、林開忠、李美賢、張翰璧，2005，〈東南亞的客家會館：歷史與功能的探討〉。《亞太研究論壇》28: 191。

Khay-Thiong, LIM, Hsin-Huang Michael HSIAO, 2009, "Is There a Transnational Hakka Identity? ：Examining Hakka Youth Ethnic Consciousness in Malaysia.". *Taiwan Journal of Southeast Asian Studies*, 6.1： 49-80.

Sjaastad, Larry A., 1962，"The Costs and Returns of Human Migration." *The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1962, *70*（5, Part 2： Investment in Human Beings）, pp. 80-93.

四、報章與網路資料

《南洋商報》（新加坡），1951 年 7 月 1 日。

《南洋商報》(新加坡)，1961 年 5 月 28 日。

《南洋商報》(新加坡)，1963 年 9 月 23 日。

《 Hakka Chinese Forum at Asiawind 》，〈 客 家 河 婆 人 過 番 〉。 http ： //www.asiawind.com/forums/read.php?f=1&i=4916&

http://en.wikipedia.org/wiki/Malaysian_general_election,_1964